

儿时琐忆

插图本

蒋彝

● 宋景超 / 宋卉之 / 译

一个中国人的童年



江西人文寻踪书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儿时琐忆

插图本

江西人文寻踪书系

□蒋彝／著 □宋景超／宋卉之／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时琐忆/(美)蒋彝著;宋景超,宋卉之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江西人文寻踪书系)

ISBN 7-80647-883-3

I.儿... II.①蒋...②宋...③宋... III.回忆录—美国—现代 IV.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464 号

书名:儿时琐忆

作者:蒋 彝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行

网址:WWW.BHZWY.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本:1/24 889×1194

插页:12

印张:7.75

字数:192 千

版次:2005 年 8 月 1 版 1 次

定价:21.60 元

ISBN 7-80647-883-3/I·540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64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蒋彝在香港大学接受所赠
名誉文学博士(一九七二年)



► 蒋彝在作画(一九七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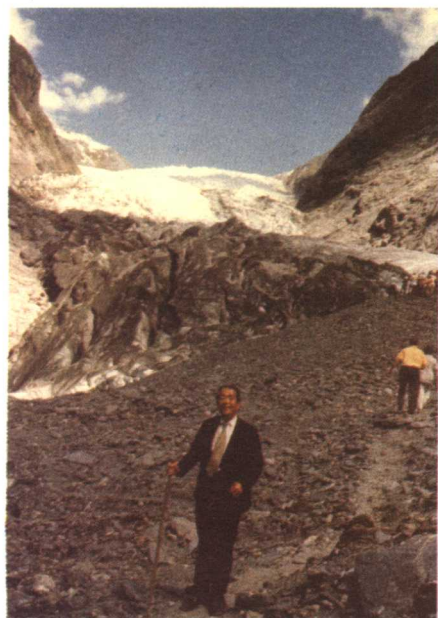


在江西师大校园

◀蒋彝(中)在江西师范大学(一九七五年)。
右为其长婿谭钜生(江西师大教授),左为其
次婿刘乃崇(中国剧协编审)。



▲蒋彝在英国(一九五一年)



◀蒋彝在新西兰东岛
登雪山(一九六七年)

► 蒋彝与次婿刘乃崇在
庐山天桥(一九七五年)



▼ 蒋彝与次女蒋健兰在杭州吴山
(一九七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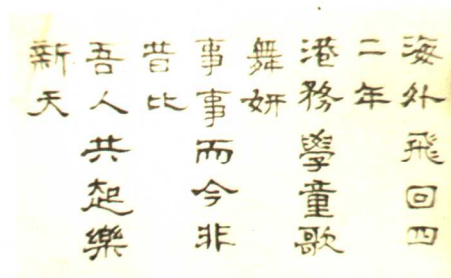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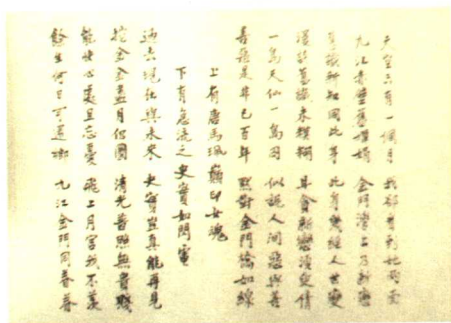


▼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蒋彝遗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其乡贤许德珩副委员长(右一)在开幕式讲话。站立者谭钜生(右四)、刘乃崇(右三)、蒋健兰(右二)等。



▲ 蒋彝与外孙刘宗武、刘宗群、谭挺等在长城(一九七五年)







一个中国人的生平

(代前言)

蒋健兰

“快交代！你父亲逃到外国去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在那黑白颠倒的日子里，“造反派”头头喊叫着让我交代。这可真真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问题。我父亲蒋彝在一九三三年离开祖国的时候，我还不满两周岁，连他的容貌我也毫无印象，我能在他的出国干些什么呢？等我刚明白事理，我的家乡九江就已经解放了。说实在的，我还真是不知道当年父亲为什么出国，也不知道他在国外究竟做了些什么。只知道从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起，我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努力与这位在海外的父亲划清界限。其实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界限，我十几年也闹不明白。不过经过这些过程，不论是政治上还是感情上，都使我那样地希望有一天能够了解我的父亲。

盼了一天又一天，盼了一年又一年，一九七五年暮春时节，我终于见到了分别四十二年、自美国回来探亲的父亲。说起我们见面那一刹那，不禁令人心酸而又感觉那么富于戏剧性。我们是亲生父女，然而却互不相认。我接到父亲将于四月间回国的信，心里充满喜悦，又感到忐忑不安。要知道，那还是阴霾蔽日的年代，是祸是福难以预料。然而毕竟是要见到既陌生又亲切的父亲了，即使就是“阶级敌人”吧，那我也可以弄个明白，黑锅背得也不冤呐！为了到机场去接时能够辨认出父亲，我不断地拿出一年前父亲托老朋友带来的照片仔细端详。父亲到京的那天，虽然有他的老友、驻联合国代表团经济顾问侯桐伯伯和另一位老友、外交学院教授李铁铮伯伯陪同我们到机场去接，但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首先认出父亲来。我怀里揣着父亲的照片，在夜幕中等待着银燕的降落。我注视着从机舱门走出来的每一个人，终于最先发现了一位老人，和我怀中的照片如此相像。他走过来了，走过来了，没错儿，是父亲。我冲口喊出一声“爹”，这是四十二年无数次在我心中回荡的声音，今天终于喊出来了。老人的正在四方找寻的目光，转向了我们这里。我们见到了，一时相对无言。四十二年，两个世界，他是父亲，可他又是“外宾”。接待人员一再告诫我们要

注意内外有别，嘴上可得留神啊！

见到父亲了，当然我最关心的是：他当初为什么要“逃”出国去？

我的父亲一九〇三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五四时期正读中学，接受了新思潮，成为一个“科学救国”论的笃信者。一九二二年他考进国立东南大学，专攻化学，立志要研究炸药，以改进祖国的军火，抵御列强的欺侮。然而毕业以后，等待他的却是失业。不得已，他只在江苏与山东接壤的海州找到一份教中学的差事。在这偏僻贫困的小城教书，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科学救国”啊！北伐战争开始，他便投笔从戎，希望通过武装革命拯救中国。北伐失败了，他又失业了。在上海他遇到东南大学的学长严济慈教授，应邀到暨南大学教了一段时间的无机化学。后来又弃教从政，当过安徽芜湖、当涂与江西九江三任县长。在县长任上，他幻想改革县政；想通过丈量土地、降低税收，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在那腐败的政界内，他的这些建议当然没有一项能够付诸实施，却因此获得了“超时代的年轻人”、“疯狂的年轻人”等等外号。九江是我们的故乡，一九三〇年父亲在自己的出生地当上了父母官，更是希望能够为家乡的父老做一点事情，但是善良的愿望终成泡影。他亲眼看着家乡的人民生活在兵荒马乱、拉夫派捐、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却无能为力，痛疚在心。父亲曾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写了一首古体诗《江州牧——自责》，发表在当时的《浔阳日报》上。诗借一老妇哭诉历年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而在开头和结尾处写道：

新任江州牧，本是江州人。

从政有年日，颇悉民间情。

比来桑梓地，何独乖民意？

……

忍哉州牧心，出此弦外音！

怨牧牧何恨，所恨上下侵！

这首诗道出了父亲对苦难中的人民无限同情，而又自责无力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苦闷心情。啊，我的父亲原来也是个热血男儿！

谁知就是这样的县长，还不能当下去，最后只落得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得罪了洋人。九江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水陆码头，当时几个省的物产都要从这里出口。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天津条约”，九江成了十个通商口岸之一。在这个地方，外国的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商人可以自由通

商,把很大的地方划归租界,只许外国人在那里活动,不许中国人出入。父亲幼年一次陪同我的曾祖父到江边散步,那里是英、日租界的范围。曾祖父走累了,想在江边的椅子上坐一下,但是遭到租界巡捕的轰赶;而在另一张椅子上,一个英国女人却让她的狗端坐在椅子上,洋洋得意。这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红毛子”可恶!在父亲任九江县长以前,美国亚细亚壳牌石油公司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早就分别在离九江县城二十多里的地方,建立了炼油厂。这块地方被当地人们称为“洋油站”,这个名称一直流传至今。到父亲当九江县长时,美国的德士古石油公司也要跻身于此分享这块“肥肉”。当时把土地卖给外国人还不是公开合法的,德士古公司的代表用大量的贿赂买通了九江商会以及县政府里的第二科科长,买了一块土地。他们做了假地契,已经缴了税,并且偷盖了县长的印章。他们打算把生米做成熟饭,逼县长认可这个交易。我父亲,当时只有二十八岁,年轻气盛,又基于他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由来已久的愤恨;再加上他们耍弄阴谋手段,要逼他就范,对于这事父亲十分恼火,坚决不同意。但是他知道一切该做的手续他们都做到了,县长一个人硬不许可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将计就计,便说:“这件事要我同意,总要把地契给我看一看。我要是连地契都不看一下,人们岂不要说我是个糊涂县长吗?”他们自以为事情已办得万无一失,让县长看看地契也无妨,于是把地契送到父亲手里。父亲接过地契当时就把它撕了,然后斥责了办事人员,并把负责税契的科长撤职押禁。这一下就大大地触怒了洋人,也得罪了上下许多有关人员。德士古公司的代表把状告到南京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催逼中国外交部办理,外交部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彻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更是火冒三丈,把父亲叫到南昌的省政府,当面训斥,不容分辩,勒令辞职,并且不允许父亲再在江西境内工作,这才迫使父亲离开祖国,浪迹海外。

父亲从学、从军、从政,到处碰壁,正当他苦闷、彷徨之际,他一位要好的中学同学、在英国留学的罗长海,极力劝他去英国。父亲曾经是那样满怀热忱,要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工作,然而却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但是他并没有气馁,他还要拼搏,最后他决定出走英伦,继续研究炸药。一九三三年五月,他从上海乘海轮出发了。在海轮上他写了一首诗述怀,这就是《船中漫吟》:

管宁浮海非逃世,梅福辞官岂近名?

我挈孤怀成独往,冰轮初辗海天清。

咳!早知道父亲是与黑势力搏斗而被迫出国的,我该引以为荣了。

父亲出国的原因是搞清楚了,然而四十多年,他在外国都干了些什么呢?这是

我关心的又一个问题。

父亲在大学所学英文本就不多，加上数年的奔波，所学无几的英语也忘得可以了。他只身闯英伦，考虑到下船找店，无法通话，事先准备好一个纸牌子别在衣服上，上写英文：“请告诉我旅店在哪里？”幸好他的同学来接他，这才在留学生公寓住下来。看来一切都还顺利，谁知一个月后，父亲的那位同学接到家里的加急电报，让他立即回国，他便走了，父亲在英国举目无亲。父亲在国内虽然做了三任县长，然而这位“超时代的年轻人”、“疯狂的年轻人”不但没有肥了自己，反而倒赔薪金，落了个扫地出门。他出国的旅费是我的伯父蒋大川和一些朋友们凑集的，到英国后余钱无多。这点钱一个要分成几瓣花，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请老师教英语当然并无可能了，他就到阅览室去读报纸；早晚到公园去和孩子们、老人们学口语会话，因为他们很喜欢有人聊天，说错了他们会很善意地加以纠正。为了节约伙食费，父亲和一些中国留学生常常去捡猪脚煮着吃。（英国人的习惯不吃猪脚，他们把猪脚都扔掉，后来发现中国学生捡来吃，就不扔而是卖了，不过价钱极便宜。）父亲还在一家药厂洗药瓶子打工。就是这样节俭刻苦，他仍然难以维持半年的学习生活。正在父亲进退维谷之际，经人介绍，他结识了英国的洛克特爵士。这是一位中国通，他喜欢中国的古文，父亲的古文底子很厚，他们成了要好的朋友。他介绍父亲到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教中文。这总算有了一个职业，有了一点固定收入，然而研究炸药“科学救国”的愿望，却付诸东流了。

父亲在伦敦拼搏了一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一件事是，Coca-Cola饮料于一八八四年问世后，到处销售，可一直没有比较理想的中文译名。于是美国Coca-Cola公司在报上刊登启事，征求中文译名。父亲以“可口可乐”既合谐音又合语义的中译名入选，他因此获得六英镑的奖金。这在他当时可是一笔不算小的收入，也使他对此后的生活道路得到一些启示。

另一件事是，一九三四年父亲收到了“人与树社团”的创始人贝克船长的一封约稿信。这个社团的宗旨是保护树林和在需要树木的地方植树。为了宣传计划筹款，贝克船长要在伦敦举办一次世界树木画展。我的祖父精于绘画，父亲幼年曾随祖父学画，后来又得到九江名画家孙墨千先生指点，一九二八年还曾于庐山黄龙寺举办过小型画展。任九江县长时，邀孙墨千先生等组画社，每月相聚，书画联句。他出国后也常为友人作画。贝克船长得知父亲是能绘画的中国人，就写信邀请他画一幅中国树木参展。父亲画了一幅墨竹参加画展，这幅画在画展开幕的那天刊登在

《伦敦标准晚报》上。这使父亲获得今后出路的又一启示。从这以后,父亲便不断画一些画,有的在报刊上发表,有的是为公园作画,于是他的画名鹊起,渐为人知。

一九三四年,两位著名的中国画家徐悲鸿先生和刘海粟先生,在欧洲很多城市举行画展,来到了伦敦,他们邀请父亲帮助安排画展事宜。徐悲鸿先生和父亲早年就曾见过面,在伦敦一起住过一个月,天天讨论画艺,很谈得来,后来他们成了极亲密的朋友,经常有书信往还。一九五三年悲鸿先生病中还给父亲寄去一帧蓄须的照片。悲鸿先生去世后,父亲把他的照片一直珍藏在身边,遗憾的是后来在一次乘地铁时,被扒手掏了腰包,这帧照片也一并丢失了,只留下了一张翻拍的。父亲对刘海粟先生的改革精神十分敬佩,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七年两次回国时都特意到上海去拜访了他。

在当时,英国人民对中国绘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由大英博物馆的古物保管人劳伦斯·宾永以及一些英国有名的中国艺术收藏家倡议,准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在英国皇家艺术院举办一次国际性的中国艺术展览。英国的许多出版家都想借此出版中国的艺术书籍,以配合展览会的开幕。阿伦·怀特先生要物色一位中国画家写一本书。怀特先生找到我的父亲,请他写。我父亲到英国只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尽管他日夜苦读,然而一个中国人,要用异国的文字写书,谈何容易,但是他答应了。他就是有一股拼劲,他要努力去争取。在阿伦·怀特先生和父亲的一位学生的帮助下,终于写出了《中国绘画》(*The Chinese Eye*)一书,正好赶在国际展览会开幕前一天出版。这本书非常轰动,两个月内再版了两次。人的一生中往往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关键在于善于把握时机,并要敢于拼搏。父亲曾为自己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道路,都行不通,到这时,他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新的曙光。他把握住了,并奋力走下去,终于由一个自然科学的追求者,转变成为被人称颂为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

从这时起,我父亲开始了他一面教书一面作画的艺术生涯。他到牛津大学讲授中国艺术,一直到他后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都是讲以中国艺术为主的课。他的画逐渐在欧美各国出了名。山水、花卉、鸟兽,他都画而且都有很高的成就。一九三七年,中国的熊猫第一次被运到英国伦敦展出,这种新奇的动物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来自祖国的“贵宾”,当然也吸引了父亲。他在动物园流连忘返。他决定要以熊猫入画,一来熊猫的毛色黑白相间,最适合中国的水墨画;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产自祖国的瑰宝。在这以前,父亲因画过一些动物、出版过一本画册《鸟与

兽》而被吸收为动物协会会员。为了熟悉熊猫的生活习性、动态,他以动物协会会员的身份,征得动物园园长的同意,到动物园和熊猫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日日夜夜对熊猫进行仔细观察。从一九三八年起,父亲便开始画熊猫了,由于题材新颖,形象生动逼真,很多人都以得到他的一幅熊猫画为快。父亲一生画熊猫近千幅,在很多画幅上,他都题有“大熊猫特产吾华”、“熊猫为吾华珍奇”等,借以寄托他自己的乡思,并表达他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他还以熊猫为题材写过两本童话故事——《金宝与熊猫》、《金宝游动物园》(《金宝游动物园》已译成中文,一九八六年由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在英国很受孩子们欢迎。一九七二年中国送给日本的大熊猫在上野动物园展出,《金宝与熊猫》被译为日文出版,又受到日本小朋友的喜爱。父亲因为擅于画熊猫,在英国人称之为“熊猫人”(Pandaman)。

父亲对于中国书法素有研究,一九三八年他写了一本《中国书法》,介绍中国的书法艺术。这本书早已成为西方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的教科书。一九八六年一月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受到国内书法界的欢迎。

父亲的书画,在世界各地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在英国、美国及中国香港地区举行过个人书画展,受到艺术界的赞扬。

我伯父年轻时,常写旧体诗,是九江有名的才子,在家乡有诗社的组织,许德珩伯伯就同在诗社,经常唱和联句。我父亲当时还年幼,也跟着学诗,因此他的诗、词根基是很扎实的,在英美时期常与吴世昌、杨联陞、周策纵等友人唱和。可惜现在他青年时期的诗作已散失难寻了。我把父亲在英、美、日本及香港地区写的诗,尽力搜集,编成了一本《蒋彝诗集》,由友谊出版公司在一九八三年出版。诗集共收集了近百首诗、词,但出版后,又搜集到百余首,就来不及收录了。

父亲在英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转到美国又居住了二十二年,他无时无刻不思念祖国和亲人,在他写的许多诗中都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如《小睡翰墨斯推得草丘上》:

海邦风味渐能谙,石枕遽然午睡酣。

草上落花红一尺,春来无梦不江南。

又如《却忆九江》:

每惭父老说微功,偶抚创痕涕泪中。

合眼乡关推不去,西风到处有哀鸿。

在《伦敦战时小记》里有诗云:

冬来苦长夜，今冬夜更长。

偏偏多短梦，梦不到家乡。

在日本参观神户古陶瓷展览时，又有诗云：

古月波烧古色香，何幸能来细考量。

贺集珉平名品展，遥思景德是吾乡。

父亲一九七二年到香港大学讲学，曾写“香港竹枝词”五十首，其中两首写道：

年年海外说还乡，未到乡前港已香。

遥望白云依旧是，白云下有蒋家庄。

贾公车我到罗湖，文锦渡头口直呼。

不见神州四十载，神州记得哑夫无？

我父亲以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研究、艺术教学的成就，曾在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地区，接受了五所大学赠予的荣誉文学、艺术博士学位，并被选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在英国和美国都被列入《世界名人录》，最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终身教授的职位退休。

父亲在英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曾尽力阅读各方面的英文书籍。他读了许多有关中国游记一类的书，书中记载让他十分不平，甚至愤怒。那些外国作者描写中国，不是女人裹小脚，就是男人抽大烟，以及乞丐、苦力等等一些社会的病态。作家们是为了把不健康的好奇心理，渗入读者的心；出版商则为了畅销赚钱。这些书在英国人心中塑造的中国形象是落后、愚昧、低能。父亲决心也要写游记，开始他就决定要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写英国，但是他要求自己做一个公正的作家，他要从各式各样的人们当中，寻找他们的共同点，而不是追求他们的差异和怪癖。一九三七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游记《湖区画记》。英国湖区是著名的风景区，许多诗人曾写诗讴歌这里动人的美景。父亲的《湖区画记》除去文字描写之外，不仅有他自己的诗，而且配有他自己的画。他赞美这里的青山，赞美这里的碧水，这里的山和水也勾起他无限的思乡之情。《湖区画记》中的最后是一首五言古诗《别湖区》：

我乡有庐山，亦傍鄱湖侧。

我家湖之滨，日夕看山色。

归去订重游，悠然生远忆。

随后父亲不仅写了英国，而且还写到别的国家。在《湖区画记》之后，他写了《伦

敦杂碎》、《战时伦敦小记》、《牛津画记》、《都柏林画记》、《爱丁堡画记》、《波士顿画记》、《纽约画记》、《三藩市画记》、《巴黎画记》、《日本画记》，编成一套“哑行者丛书”。这十二本“画记”都是用“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的笔名写的。这些书都不能算畅销书，但是读者很多，很受欢迎。例如《湖区画记》出版后，十二年间共印了六版。《牛津画记》一九四四年出版后，两年中就印了三版。这些书之所以题为“画记”，是因为每一本书中有少则几十幅，多则百幅以上他自己作的插图。这些插图有彩色的，有黑白的；有素描，有工笔，有粉彩；有水土变迁、风土人情，并常以之与祖国的山水、人情加以比较。父亲所到之处，或赋诗，或填词，把这些诗词以中国书法真、草、隶、篆书写附在书中。如《牛津画记》中题伊福雷教堂：

远树群鸦噪夕阳，小桥流水似吾乡。

钟声飘渺随云出，翠绿丛中古教堂。

又如《日本画记》中题庐山寺：

风枝摇曳似相招，雨径清幽意转饶。

陶令远公今岂是，共君闯过虎溪桥。

《巴黎画记》中有“乡思”诗：

怪石似东土，倒影情更幽。

他乡亦佳丽，何必忆江州？

父亲的笔名用“哑行者”。说起这个笔名，还闹过一个笑话：他出版《湖区画记》时，英文书名为“哑行者在湖区”，出版商反对他用这样的书名，原因是怕招来“苏格蘭广场”安全人员的调查：为什么一个中国佬在英国旅行而不愿讲话？父亲虽然觉得可笑，但也不无心酸。经过协商双方达成协议，把书名改成“哑行者：一个中国画家在湖区”。父亲用这个笔名，很多人不理解，也引起过各种猜测。父亲告诉我：他被迫抛妻别子，远走异邦，犹如一个游方和尚。他有言无处发，有冤无处诉，形同哑巴，就用了这个笔名。他曾经写一首自嘲诗：

世间只有三行者，一孙悟空二武松。

第三轮到江州老，不能打虎无神通。

这里他道出了以“哑行者”为笔名的真正含义。

三四十年代，英国人民对中国了解甚少，似乎只有鸦片战争以后由他们的长辈传下来的模糊印象：中国腐败，中国人愚昧、低能。这样的认识深深印在了他们心中。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就连儿童在街上见到中国人，也要在背后扔石子、吐唾沫。

父亲写的书和所作的书画流传于世,在一些读者和欣赏者中,出现了“蒋彝是日本人”的流言,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人会有这么高的才能。父亲非常气愤,马上写信回来,让家里人给他寄去一身长袍、马褂。他特意穿上这身中国服装参加各种活动,到大街、公园去走动,尽管不免有时挨上几个石子或几口唾沫,也毫不顾忌。为了向所有的读者宣告“蒋彝是中国人”,父亲于一九四〇年出版了这本《儿时琐忆》。封面为他的幼年、少年、青年三个时期的自画像,都是穿的中国民族服装。书中记叙了他儿时的所见、所闻、所做,都是深具中国民族特点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我们九江的民俗、民情,如婚、丧、喜、寿,逢年过节,人们穿的、戴的、吃的、玩的。父亲用了上百幅插图,把这许多饶有趣味的民间生活习俗反映出来,增强了读者的直观感觉。这本书在伦敦出版后,很受欢迎,十三年内再版四次。从此,再没有人说蒋彝是日本人。父亲以自己的实践向西方人证实了中国人不是低能儿,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感谢我的好友宋景超和她的女儿宋卉之同志,在这本书出版后半个或多个世纪的今天,以流丽的译笔,把它译成中文,使这本书的中译本得以出版。父亲生前一直盼望祖国的读者有一天能读到他的书,这个愿望正在一步步实现。这已经是在祖国内地出版的第四本他的书了,我希望他的“画记”将来也能译成中文和读者见面。

我父亲在一九七五年回国探亲、参观访问两个月,回到了美国,写了一本《重访祖国》,还是用英文写的。他说:“在这整整六十天当中,我记下了我个人的感受和看到的各种景物,以及我和家人讨论的事情。这些事物,就是构成本书的主体,也就是我个人在一九三三年前和四十二年后亲身经验的记录。”这本书经殷志鹏博士和廖慈节博士夫妇译成中文,题名“重访中国”,一九八〇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可惜内地没有发行。

一九七七年父亲再次回国。他要以祖国的文物资料为依据,写一本《中国艺术史》,以驳斥那些中国文化西来的谬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唯一的目的,是要让世人对于中国文明瑰宝之一的中国艺术有更多的认识,以及帮助他们对于中国艺术有更全面更彻底的了解。”父亲治学严谨,艺术见解鲜明,从不肯人云亦云。他曾经到埃及、巴比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这次回来,也为了要进行实地考察。在五十天内我陪同他走访了十一个省市,到了西安、殷墟、大汶口、洛阳、巩县、江西、上海等地。这时父亲已七十五岁高龄,而且做结肠癌切除手术刚一年多。为了争取时间,我们日夜兼程,到处参观访问,他不让自己有一点空闲的时间。在巩县,为了翻拍巩县石

窟的资料，因为我们在巩县只有一天时间，他就利用午休时间，在太阳底下整整工作两小时，下午接着又去参观。眼看着父亲一天比一天消瘦，精神也愈来愈疲惫，大家都劝他注意休息，他却总是笑一笑说：“我一生写了那么多书，但是没有为自己的祖国写过一本书，我不能空着双手回来，我要努力尽快把这本《中国艺术史》写出来，作为对祖国的献礼，然后回来定居。”他前次回国时曾写过一首诗：

远离亲故年年梦，不见神州四二春。

拭目飞回新宇宙，行将热血写昆仑。

正是这一信念支持着他，抓紧时间，努力工作。然而他终于没能战胜病魔，就在我们从济南回到北京时，他病倒了。协和医院诊断为结肠癌晚期，已全身扩散，无法挽救了。到这时我才真正了解他为什么那样分秒必争，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然而他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他身患绝症，他只是轻松地告诉我他结肠上曾有个瘤子，良性的，已经切除了。直到住进医院，他才把离开美国时，为他做手术的大夫的一份医嘱交给大夫。可是太晚了，他的老朋友、北京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来看他，也回天乏术了。十天以后，就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父亲带着遗憾却又十分满足地离开了人世。他遗憾，没能带着他的著作回来献礼；他满足，终于叶落归根，实现了他“生为汉人，死为汉鬼”的誓言。我们根据父亲的遗言，把他的骨灰送回九江，安葬在背靠庐山，面朝长江东林寺边的高山上。父亲在《重访祖国》中写道：“我相信中国将来的变化，是愈来愈好，而非愈变愈糟。”“只要我活着和有力气，我一定要看看更多有关中国的事物，以期为我充满希望的想法和预测，提供更多的证明。”

安息吧，父亲！你已经看到了你的预言正在逐步实现，你还将看到一个更新更美的中国屹立在东方！